

钱钟书、闻一多、季羨林……

这些大师真是被清华破格录取？

近些年来,对民国时期大学的怀旧形成一股热潮,有些流传甚广的民国学术大师被“破格”录取的故事在一些报刊媒体上频频亮相,一方面传播了失实的历史,一方面则可能令一些青年对民国时期的大学产生误解。

在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故事中,无论是钱锺书、吴晗还是钱伟长、闻一多,清华学人的故事流传颇广。

然而,这些学术大师在被清华录取的时候并未“破格”,相反,他们的录取过程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招生规范。所谓“破格”的印象,大部分是由于人们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情况了解不够,将当下的教育制度投射到历史时代而导致的。

“破格”录取的说法不实

钱锺书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故事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很多人深信不疑,较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说法来源于钱锺书自己的回忆。

钱锺书是1929年被清华录取为一年级新生的,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当年的入学考试中,钱锺书的数学只考了15分。

而钱锺书自己的回忆则是:“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

首先,钱锺书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的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其次,已经有学者指出,通过一些清华校友的回忆印证,这种“破格”的说法似乎也很值得怀疑。

我们不妨从制度层面来进一步考察1929年清华是如何招生的,以及其录取标准究竟有哪些。

就报考资格而言,1928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都有资格报考,清华的招生简章中则对这个问题规定得更详细:“投考者须具左列资格之一:公立高级中学或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国立大学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预科毕业;同等学校(如六年制师范学校,惟以公立或私立经立案者为限)毕业。”

1929年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如下:总平均分40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即数学,下同)三门平均40分以上。

其中部分科目有最低分限制:“国文要求不低于45分,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算学要求不低于5分即可。”

因此,若钱锺书的数学成绩为15分,而国文、英文两科又十分优秀,显然符合清华对新生的录取标准,并非是“破格”。

据他人回忆,钱锺书的成绩虽不需要被“破格”,而且排名较为靠前,在清华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名第57。

而彼时的清华学生人数很少,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单独指导学生,甚至一起用餐都十分常见,因而罗家伦专门将钱锺书召至办公室,也并不能作为“破格”录取的证据。

季羨林比钱锺书晚一年进入清华。据他回忆,1930年,他同时报考了北大、清华两所著名大学,皆被录取。据称季羨林投考清华时数学不到10分(另一种说法是4分)。

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依然符合清华的录取标准。1930年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是:总平均分45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三门平均49分以上。

相比于1929年,1930年清华的招生标准中没有限制单科的最低成绩,只对于平均成绩有所要求。

事实上,当年的考试并非只有国文、英文和算学三个科目,还有党义、

是被清华“破格”录取。

此外,在1931年清华的新生入学考试中,其实并没有历史这一门,仅有必考的本国历史地理和选考的世界历史地理。

显然,无论是必考科目还是选考科目,历史和地理都是一并测验的,并不存在单独的历史科目。

而且,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中,有关二十四史的题目也仅是众多考题中的一部分。

钱伟长也并非这一门考试得了满分,而是在考卷中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满分。

另外,当年国文的考题为作文,题目是“本试场记”“钓鱼”“青年”“大学生之责任”中任选一题,文言白话均可,而并非传闻中的《梦游清华园记》。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

综上,可见关于钱伟长“破格”录取的传说不实。

另一个广为传播的故事是关于吴晗的,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吴晗原本就读于上海,后追随胡适到了北京。

他投考清华时数学考了零分,因为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而被清华“破格”录取。

而事实则是吴晗的数学的确不好,在投考清华的同时他也报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但都因数学成绩太差而折戟沉沙。

但是,他被清华录取时参加的是历史系二年级的转学插班考试,并非一年级新生的招生考试。

在吴晗投考的1931年,清华历史系招收二年级学生的考试科目如下:“一、党义,二、国文,三、英文,四、中国通史,五、西洋通史,六、大学普通物理、大学普通化学、大学普通生物学、伦理学任择一门。”显然,其中并没有数学一门,因此传说自然不攻自破。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传说闻一多也是因作文颇佳被“破格”录取至清华的。其实,这件事发生于清华在湖北省的初试环节。

该年的湖北省内“初试是在武昌举行的,科目有历史、地理、算学、英文。他的这些成绩都较平平,但是一

篇《多闻阙疑》的作文却得到考官的惊异。

这篇题目与闻一多的姓名有关,好像曾经练习过,关键是他摹仿梁启超的文笔——那时最为时髦的笔法,竟出自一个少年之手。

果然,这篇出类拔萃的作文使他获得备取第一名,有了入京复试资格。复试时,他以鄂籍第二名被正式录取。”

因此,闻一多并非因为一篇作文而被清华学校“破格”录取,最终决定他能够被清华录取的是在北京参加的复试的成绩。

当时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选拔,首先由各省推荐,而各省内部往往由于缺乏经验,选拔过程各异,尚未形成一种严谨的制度规范。

闻一多所在湖北省毕竟还为此事专门举行考试,而有的省份甚至只有口试。

民国教育导致“偏才”

民国时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以今天的评价标准来看,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而当时大学看似灵活、多样的招生制度,实则是出于教育水平发展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无奈之举。

近代以来,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需求,新式学堂、大学纷纷设立。

不过,近代教育的转型尚需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因为当时大学课程中多采用英文教材,而许多理工学科对学生的数理水平要求也较高,所以彼时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能够被一流学府录取的关键因素,往往在于其英文和数学的成绩。

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源不仅十分匮乏,在城乡、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布也极不均衡。

当时一名学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需要200~300元,而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才10元左右,这般开销自然不是普通工农家庭所能够承担的。

如果生在乡村或者小城镇,往往需要有家庭、宗族、朋友等社会关系介绍,学生才有机会到大城市的中学读书。

而民国时期,私塾教育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出身于传统知识阶层家庭的学生也往往容易在家庭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

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若生于书香门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未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数学教育,甚至几乎从未接触过这两个学科,自然就会出现文史颇佳但英文或者数学极差的“偏才”。

本质上,此种情形是由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水平不成熟、不均衡导致的,恰恰意味着教育制度需要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革新。

图文来源:光明日报